

人生丛书

孙东生
江一编

留洋归国的真实故事

再吻中国

当代中国出版社

再吻中国

——留洋归国的真实故事

孙一江 范东生 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吻中国:留洋归国的真实故事/孙一江,范东主编.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12

(人生丛书)

ISBN 7-80092-778-4

I. 再… II. ①孙… ②范…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120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100009

地质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6 插页 259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6.00 元

他们还是选择了回国

(代 序)

这是一本由许多故事构成的书，其中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的。

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 20 年间最大的变化就是“选择”——国民有了前所未有的选择空间和选择自由。这本书的主人公们在选择上有一个共同点：当年他们都选择了出国，如今他们又都选择了回国。

无论他们是部长的儿子，还是平民的女儿，当初上飞机的时候，为他们送行的都是艳羡的目光，而当他们回国后，看他们的眼神就复杂多了。传媒有“归国学人矢志报国”的报道，坊间也有“混不下去才回来”的传言。其实，他们每一个人的

真实故事——他们为什么出国又为什么回国，他们遭遇了什么又成就了什么，他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他们的故事，要比一般人的想象复杂、有趣得多。

值得一提的，本书的作者多数都是“归国学人”。其中，有直接写自己的，也有的是对同类的访问和记录；因此，这本书可能有更多的感情色彩，但也可能更接近真实。

就像每个人都有一个人出的动机，每个人也都至少有一个回来的理由。尽管他们不太愿意被简单归类为“爱国”；但事实上，不论是高校学者还是外企白领，是自由职业还是家庭妇女，是只身下海还是合伙创业，是雄心勃勃还是心平气和……，当他们重新选择了中国，也就将自己的未来寄望于中国。惟其如此，他们对中国的缺憾也就格外敏感。“爱之深，责之切”，在他们的尖锐的批评中，更多的是他们对中国的期待。

因为工作关系，我很早就和这类回国的人有交往。他们穿的也许特“老土”，他们出手也许特抠门儿，要不是他们有意无意地撇几句洋文，你常常会忘了他们曾经出过国。但是他们看中国的事儿，常常别出心裁，独具慧眼。比如，10年前售货员态度不好，他们不说是教育不够、管理不严，他们说是因为售货员手中掌握着分配给你的物资。你无法一直和他们辩论——10年后，在堆积如山的商品前，不论真假，所有的售货员都学会了笑。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出国让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视角看中国。在他们的故事里，到处都有这样的新发现。半夜捧读这些故事，会让人大笑失声，也会令人心酸不已。

这些人也有自己的苦闷和烦恼。回国者中，梅是我接触的第一个，那是在80年代初。梅是从法国回来的。我知道

她时，她已经在几次自杀未遂后终于自杀身亡。我为她做了一点儿我所能做的事之后，还为她遗憾了很久——为她没能适应我们的社会，也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没学会接纳她。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了梅的故事，想到了梅以前七八十年间“归国学人”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悲喜剧。我真高兴在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回国者的故事已经是另一番情景。

读了他们的故事您会发现：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带给中国的，将超出很多很多人包括他们自己的想象。

也许有一天他们又选择了出国，我会同样高兴——为中国允许他们选择。

感谢所有为本书撰稿的作者。因为这些故事，我又多了一些朋友。尽管有的人我们至今还没有机会见面。

本书图片由我所供职的《华声月报》提供。感谢我的同事史利、法满等对此给予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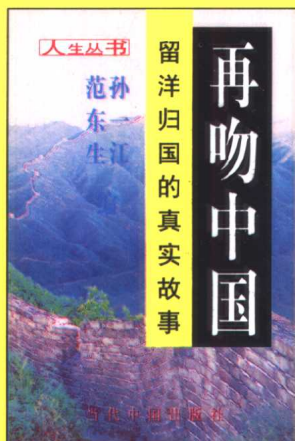
感谢《华声月报》前任总编辑、我的合作者范东生先生在本书选题、组稿、编辑过程中给予我的鼓励与支持。

最后，还要感谢我最好的朋友、巴黎归来的白少帆教授为此书给予我的所有灵感。

孙 一 江

1998 年 9 月 26 日

人生丛书



《再吻中国－留洋归国的真实故事》

■ 主编 岩江

■ 策划 陈德仁

王凡

张彤

刘小晖

■ 责编 王凡

■ 封面设计 鲁忠民

北京人回北京

张妤丹，1957年10月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曾当过生产队“地头批判会”的批判对象。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七七级本科。1982年毕业后，在《经济日报》任记者、编辑，获1986年全国好新闻奖。1989年出国，曾在加拿大新时代广播公司工作，后在香港传讯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担任新闻主播和节目主持人，用名“张丹丹”。1997年5月回北京。

1997年3月15日，我向传讯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总裁递上了一份只有三行字的辞呈。隔了一天，香港《快报》的头版一条报道我们电视台的消息中说，“主播张丹丹已经提出了辞职”。

结果那一天早上一到台里，我就接到了许多关心我的朋友们的电话。他们大多问我为什么好好的突然不干了，是不是在香港另有高就。

随后一个星期，台湾《中国时报》和香港《亚洲周刊》等相继提到我辞职这件事。一位在美国的朋友也看到了报上的消息，打来电话查证。正在香港讲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提议说：你要是真不干了，就回北京考人大的新闻博士生吧。

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要回北京，未来做什么还不知道。

如果每天都想走就不用找理由

1994年，是我在加拿大工作上最得意的一年。当时加拿大的社会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左右，从大陆来的华人大多为找工作而犯愁，我却有两份工作。一份是全职的政府雇员（温哥华教育局），一份是从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在当地电视台做国语新闻主播。我被温哥华的朋友们称为“工作机器”，有人说我应该让给他们一点儿。

那是我在加拿大生活的第五个年头。我开始有一种什么都不大对劲的感觉……生命中似乎缺少了什么。我琢磨了好长时间，结果发现，原来是我每天十四五个小时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没有创造力和挑战性。而我的生活也是那么有规律，除了在电视里读的新闻不一样，每天的日子都不过是昨天的

重复。加之这里北京人不多，可以推心置腹“侃”上一通的朋友就更少了，就算在市中心最豪华的酒店参加宴会，也有一种失落感。

温哥华的美丽景色和舒适的生活环境开始对我失去意义。有好几个月，我在走与留之间徘徊着。终于有一天，我向两个“单位”递上了辞职信，买好机票，拿着自己的录像带跑到香港找工作去了。

当时不想在加拿大呆着的另一个原因，是温哥华离中国虽然不算太远，但回来一趟也要 10 几个小时。每天要在电视里念上一两条有关中国的新闻，再翻找报纸上有关中国的消息，总有一种“隔岸观火”的感觉。此外，最重要的，我在当老师和做电视二者之间，还是比较喜欢电视。作为讲国语的新闻主播，我想到一个中国人多的地方，拥有更多的观众。

抵达香港的第二天，我就顺利地拿到了工作合同。在这家全球卫星电视台工作的第一年里，我忙于重新建立自己的事业。最初的工作是播新闻和做实况新闻节目，我将主要力量放在进一步提高播音技巧上。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在屏幕上出现的形象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新闻稿虽然是别人写的，但我一边念一边可以加上自己的语气、声调、重点和表情处理，也就是要突出自己与别的主播的不同的风格和个性。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让观众记住你、喜欢你、被你吸引，每天非要打开电视追着看你。

后来，我又有了自己的每周固定栏目《北京内外》，这是一个较深入探讨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国际关系问题的节目。我不想让它变成那种揭露阴暗面或发泄不满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启发人们更深层次

的思维。每期我都设法采访到一些有分量的专家学者，从策划、采访、主持，到编导、监制，甚至打字、上字幕，什么都干。平均每两周就要飞一次北京。

香港的工资比加拿大又高出许多，工作起来也相当自由……只要老板给我这个职位，他就会尊重我的创意和制作。老板是和观众同步收看我们自己发射播出的节目的，我们的新闻频道是他办公室由 10 多家电视台的屏幕组成的一面多姿多彩的墙中的一块。

我的栏目《北京内外》属于新闻杂志一类的东西，按最初的栏目设计要求还是代表电视台的观点或立场。但老板很信任我，再加上他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对我这个如此重要的节目竟不管不顾。如果有一天他醒来时定睛一看播出的节目不大对劲甚至被吓了一跳，他就会在电梯里碰到我时提两句看法，但从不要求事先调来播出带“送审”。

紧张有意思的三年很快过去了，当这一切发展到按部就班时，我就又觉得香港的这份工作不是那么富有挑战性了。

大脑有了环顾左右的空间，我开始想自己是怎么回事儿。而且，此时我又有了新的苦恼。由于我们的老板十分怕共产党说他搞“精神渗透”，所以他专门给我们的卫星节目在中国大陆的上空锁码，连香港人民也看不到，只有在“一国两制”以外的地区才能接收到。这样一来，我不但无法融入香港社会，也更别提我的工作可以为几亿人服务了。

这里没人知道我是谁（对我来说就是没有什么认同感和归属感），香港“有头有脸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数来数去，志同道合的人还是那几个大陆来的“狐朋狗友”。

我跟人说，我在香港是“胸怀世界，与世隔绝”。全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我可以第一个用中文报出去，有时还抢在

CNN的前头，但我是被关在玻璃房子里（我们的主播室四面是玻璃），每天忙活十几个小时，下了班回家还是看电视（有朋友称我为“看电视专家”）。真的有一种身处国际大都市、却又远离人类社会的感觉。

再后来，我对自己是不是还应在香港呆着也产生了疑问。

记得一年前，我的一个好朋友、大学毕业后即移民到加拿大的香港人对我说：“张妩丹，我下次不要在香港看到你。你要知道你的根，也就是你的社会关系全在大陆，这里不是你的地方。”她说她也会在这两年带着三个孩子返回她的老窝香港。

静下来时我开始想：我这辈子难道只干新闻这一件事？我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我是在生活呢还是仅仅算活着？我到哪里才能找到温馨的亲情，个人的或集体的？人的归属感真的那么重要么？

独自在外闯荡了七八年，凭着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到陌生社会的一席之地，可以得到不错的报酬，然后再用金钱去换来自己喜欢、想要的东西，这样固然很好。但有时候，也要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失去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开始，我大概是几个月一次，想搬回北京住。后来变成每个星期都要想，再后来不知为什么，每天都琢磨着怎么回北京。如果你天天都在想去做一件事，那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去做就好。

以前无所谓的事现在却看不惯了

我要回北京，并且干脆一下辞了职，朋友们都认为我疯

了。在众人眼里我是一个极守本分的人，大概是因为我的脸有欺骗性，特别是对着镜头时的一脸庄重。

按照公司合同规定，我提出辞职后两个月才可以走，我跟电视台人事部门详细计算了我的假期和应补休的假，居然再干上十几天就可以走人了。

有一本英文书叫《Take a Year Off》，专门教人如何在工作了一段时期（5年10年或20年）后自己放自己一年假，或是去旅行，或是重返学校，或是在家看书写作。作者说当你不再整天早出晚归地忙碌时，一个人可以静下来反思一下自己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或许可以找到新的兴奋点、新的爱好、人群，以及新的职业和创业机会。我想，如果我回到北京一时找不到什么可做的事，就当我是在“take a year off”吧。

悄悄地回到北京，碰到生人问我是做什么的，就答“下岗女工”。一开始还不敢大面积地惊动朋友们，怕把人吓着，也怕招人骂，比如老同学鲁薇肯定会撇我一眼说：“张妩丹你可真够闹腾的啊！”

有人担心我在国外呆久了，一下子回国恐怕有个适应环境的问题。而我认为，温哥华和香港对我来说都是极其陌生的环境，但我几乎都是第二天就适应了，现在回到自己的老家，肯定比适应外面的环境容易得多。

环境容易适应，当然也有对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同胞以前无所谓现在却看不惯的地方。比如，我住的亚运村安慧里小区有一条单行线，只能出不能进。但百分之八九十的开车人都竟直地往里进，连邮局的车也是这样。

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不多花两分钟在前面几十米处绕一下，为什么不以遵守交通规则、做个守法的公民为荣。别

人告诉我，只要那儿没站着警察，大多数的交通路标和警示就是废物。

另外，北京过了夜里 12 点，路口有警察拦车查验身份证。

我在安慧桥被查过三次，第三次不但看了身份证还把我的皮包拿走翻了一遍。我一个个地告诉警察，那是相机，雨伞，这是钱包、化妆袋，我从北京音乐厅刚买的几本书他也翻了一下。翻完包一句评语也没有，一挥手放我走了。

我问出租车司机：“他们是不是找枪呢？”司机说：“查避孕套。”我一听觉得好笑：我是“育龄妇女”，响应党的号召只生一个孩子，包里装着避孕套应该是正常的，没有才不对呢。在美国和加拿大，十六七岁的女孩儿和人约会，做母亲的也许还会提醒她带上避孕套。

司机又说，他们查“鸡”呢，你没有东北口音应该放你走。原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效益不好，很多女孩儿就跑到北京来谋求生路。

我说：“他们一看身份证就知道了我的年龄，有这么老的妓女吗？再说，抓人要抓现行，难道仅仅因为我身上有避孕套就证明我卖过淫吗？下次我还非在身上揣着避孕套不可，看他们怎么处置我。”

司机一听有点儿急，说：“大姐，你可千万别去试，除非你是记者。否则他们会把你往拘留所一扔，叫其他的犯人先揍你一顿再说，你犯不着跟他们斗气儿。”

他还给我举了个例子，说他朋友的老婆下班骑车回家，大概是违反了交通规则，跟警察拌了两句嘴，结果在拘留所关了五天，期间不许打电话跟家人联系。而他的家人满世界找她，还以为她被车撞死了呢。

听司机这样一讲，我竟立即怀念起加拿大的警察来。记得在温哥华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九点多下班，开车下了一个桥，看到前面所有的车都要慢慢靠边停下，接受警方的酒精测试。一位警察示意我摇下车窗，弯下身来问：“你喝酒了吗？小姐。”我说刚下班，这是回家呢。他笑着朝我一挥手：“You have a nice evening. Bye-bye!”他不但立即相信了我的回答，还送给我一个美好的祝福，于是我开大车中的音响，唱着歌回家了。

还有一次，我看到警察抓到一个酒后开车的嫌犯，他把那人用手铐铐起来，两人一起站在路边等候专门运嫌犯的车。囚车一到，警察为嫌犯打开手铐，竟伸出手跟他握了一下，另一只手还在他肩膀拍了两下，才驾警车离去。

1993年，我从温哥华的报纸上看到一个民意测验，说是最受加拿大老百姓尊敬的职业中，排第一位的是警察，第二位是教师。回北京后我曾跟朋友开过玩笑，说中国的警察要是跟加拿大的警察一样，我就会立即报名去当警察。

这之后，我又遭遇了一次警察。

在亚运村门口，警察看了我的身份证，手里握着警棍冲我大吼一声：“下来！”我只好乖乖地走出车外。他让我到路边，和刚刚抓到的怀疑是“鸡”的女孩子们站在一起。

晃着警棍的警察过来问：“你身份证上的住址是石景山区的，你跑到亚运村干吗来了？”他期望我答“卖淫”什么的，可我说：“你看看我的身份证是哪年发的？都十几年了就不兴搬家吗？我住这儿。”

他不信，叫我在他们的本子上登记了住址和电话，说“明天早上亚运村的片儿警会到你家查你”，然后才放我走。

这件事最让我生气的是，现在警察连眼力都不行了，根

本分不出敌我。

重新了解中国实际

国内的新闻体制我比较熟悉，目前仍有一些局限性。新闻从业人员“高人”也很多，但还没有到所有的好点子都能变成现实的好时候，因此我觉得重操旧业的机会很渺茫。电视台暂时干不成，可以做别的，换一种活法。

10多年前在《经济日报》当记者时，曾以“元老”自居，敢想敢说。该做的都做过，不该做的也没少做。现在书看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懂得太少，人也就谦和多了。心想，刚回来挣钱不忙，关键是多走走，多看看。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此时已在全国小有名气，是很多演讲报告会上最受欢迎的演讲者，现在又成了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的策划。这天，他拉我参加一个贵州省六盘水市扶贫考查团，我正好想去那里看看。所以，我回北京后做的第一件正经事，就是上贵州“扶贫”去了。

我有充分的理由去一趟贵州。因为今年2月我曾经回北京做过一个题为“走出西部贫困之路”的节目，主要是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中国的贫困问题。我当时找到了正在北京出差的中共六盘水市委领导，看了他们下乡时拍的破房子破学校的照片，还有省台的资料片。当时我的感觉是贵州的穷简直是不可救药，和自然环境甚至人种都有点关系。

当地干部提出的对策是，通过劳务输出把经过技术培训的青年送到沿海地区的企业去长见识，换观念，每人每年还可省下500斤的口粮。而走出去的人，再回到家乡就不一样了。



作者（左一）在贵州“扶贫”考查

据说，当地许多村庄的墙上都被刷上了大标语，比如“要致富，靠劳务”，“在家受穷可耻，输出致富光荣”，“输出一人，脱贫一户；输出百人，脱贫一村”等等。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时间亲临贵州拍外景，只好用一些照片和江总书记视察六盘水的资料片，回到香港完成背景资料制作就把节目播出了。

现在为了去贵州，我要先把加拿大香港北京的高楼大厦、汽车马路、干净整洁统统从头脑中清除掉，然后再一遍遍地回忆20年前我在北京郊区插队时的情景，特别是盘山路有多么陡峭，苍蝇蚊子多爱围着你，厕所无处落脚等等。

事实证明，我的精神准备做得太有必要了，而那里的贫困也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也更加理解了当地干部为什么要“官逼民富”，恨不能把那里的青壮年都赶到沿海地区去“见识、锻炼几年”。

我们这个团里除了我10多年的“死党”人民大学的周